

外來投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 分佈不均度之分析

黃 智 聰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高 安 邦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余 姿 瑩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衡量與分析外來投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間分佈不均的程度。研究的資料主要是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對外經貿統計年鑑、與中國大陸商務部所提供的外來投資的中國大陸官方資料，並採取Mookherjee and Shorrocks (1982) 修改後的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做為衡量外資分佈不均的方法。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為，在一九八五～二〇〇二年間，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分佈有著相當不均衡的狀況。並且，外資在中國大陸的地區分佈高度不均的情況，主要來自於外資在中國大陸七大經濟區域間的分佈不均。

關鍵詞：不均度、中國大陸，外來投資、吉尼係數

* * *

一、前 言

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面臨著資金不足和技術落後的問題，以致於在一九七八年確立改革開放政策，企圖透過利用外資的手段來加速工業化及促進產業升級。也就是期望能利用外資投資來推動國內生產要素的投入，讓國外資本利用於國內資本形成，實現國家經濟成長^①。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也想要藉由外資企業產品的

出口，來賺取更多的外匯。事實證明，外資企業先進的操作和經營技術，不但為中國大陸帶來經濟成長的動力，而且也加速了舊企業的改造。在一九九四年之後外資企業的產品出口每年度都有大幅的增長，外資企業已經由增加稅收轉變為在創匯上的一個重要新力量。因此，Fanzhang Huang 指出，外國投資在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和經濟改革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②。而黃智聰、潘俊男也指出，外資對中國大陸除了有增加稅收、增加利得等直接效果之外，還會對市場結構產生影響，導致廠商調整其行為，進而產生經營績效變化等外溢效果^③。凡此種種，皆證明外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雖然，引進外資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小的負面影響如 Hu and Jefferson 所言，外來投資有排擠中國大陸國內生產和銷售上的風險^④。然而，引進外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的主要負面影響，卻是顯現在地區性經濟發展差異過大的問題上。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所採取的外資政策以及區域政策，主要是依據不均衡發展理論的梯度發展策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各區域之間因地理位置，以及中國大陸政府在改革期間所實施的沿海傾斜政策，使得中國大陸各區域在吸引外資投資有明顯的差異性。沿海地區之所以會吸引較多外來投資，Broadman and Sun、張新與 Hsiao 皆認為主要原因除了政策的因素之外，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水準、基礎設施、教育水準都比內陸地區要高。另外，Hsiao 也說明東部沿海地區行政效率較好，能快速批准外商投資也是主要原因之一^⑤。而 Wei 則表示，沿海地區資訊成本的較內陸地區低廉，以致於外資多

註① 中國大陸於 1979、1986、1988 年先後頒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三項是吸引外資的基本法律。另外，於 1991 年通過《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合資、獨資及合營之「三資企業」所得稅徵收細則。中國大陸希望利用外資藉以彌補國內資金不足，擴大出口以賺取外匯，引進國外技術及促進產業升級，改善交通、能源、原材料等經濟發展的瓶頸。

註② Fanzhang Huang, "China's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6, no. 2 (Summer 1995), pp. 217~232.

註③ 黃智聰、潘俊男，「大陸地區製造業產業結構的決定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2 期（2002 年 3 月），頁 97~123。

註④ Hu and Jefferson 是以中國大陸電子業及紡織業兩種產業作為研究標的，指出來自不同地區的外資及其規模，對中國大陸本土企業的生產和銷售短期而言，會降低國內企業的生產力和市場佔有率；但是就長期而言，中國大陸本土企業在生產力方面的劣勢已經隨著外資企業密集投資的壓迫下逐漸消失。A. Hu and G. Jefferson, "FDI Impact and Spillover: Evidence from China's Electronic and Textile Industries," *World Economy*, vol. 25, no. 8 (August 2002), pp. 1063~1076.

註⑤ Harry G. Broadman and Xiaolun Sun,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World Economy*, vol. 20, no.3 (Fall 1997), pp. 339~361; 張新，「我國利用外資的地區分佈特點與對策」，*武漢教育學院學報*（武漢），第 2 卷第 18 期（1999 年 4 月），頁 67~70; Cheng Hsiao and Victor Gastanaga, "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Review of Pacific Bas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cies*, vol. 4, no. 4 (Winter 2001), pp. 479~493.

投入在東部地區^⑥。以上種種因素，使得外國投資者傾向投資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造成各地區的投资差異。

Zhang 指出，由於外資在地區分佈上的差異很大，因此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⑦。中國政府深知，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拉大將導致的嚴重後果。所以，在一九九六年開始的「九五」計畫，中國大陸為了促進其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形成具有特色的區域經濟，將整個中國大陸劃分為七大經濟區域，以作為研究外資投入中國大陸各地區差異性的基礎^⑧。另外，李清俊指出，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一九九七年間引進外資已經達到長遠的發展；而且在區域差距方面，也開始加強外資投資的產業和區域導向，並引導外資往中西部投資^⑨。在一九九九年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指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是全國發展的一個大戰略。二〇〇〇年一月，中共國務院頒佈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文件，成立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十六日制訂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⑩；並於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西部開發統一政策，發佈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⑪。這顯示出中國大陸在繼續開放東部沿海的同時，也採取了有力的措施來引導和鼓勵外資投入非沿海區域。

二〇〇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後，服務業進一步對外開放，外資為更接近消費市場必然深入中國內陸地區。中國大陸希望藉此能順利引導外資進入非沿海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以減緩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間的分佈不均現象，並進一步改善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過大的問題。然而，中共政府提出這樣的政策之後，外來投資向沿海傾斜的情況是否有所改善，此一問題，鮮少有學者論及。再者，有關於外資獨好某些地區而造成分佈不均的原因，現有文獻已有相當的探討。但是，針對外資每年在各地區不均度的動態改變與時間趨勢，卻也是少有學者加以論述。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夠瞭解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外資投資在地區間分佈不均的問題，並初步提供有關中國大陸各地區外資投資不均程度的資訊。另外，希望比較中國大陸在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前後，其外來投資在地區

註⑥ Yingqi Wei, Xiaming Liu, David Parker and Kirit Vaidya,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vol. 33, no. 9 (September 1999), pp. 857~867.

註⑦ Wei Zhang, "Rethinking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 34, no. 1-2 (April 2001), pp. 113~138.

註⑧ 中共政府認為短期會使各區域之間差距擴大是總體快速發展過程中所會面對的問題，其目的是為了帶動全國的經濟成長使得區域差距終將縮小。

註⑨ 李清俊，「外商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10期（1998年10月），頁43~52。

註⑩ 此為中共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三部委，為吸引外資，共同制訂，並經國務院批准，2000年6月16日以三部委令發佈執行。

註⑪ 其中，在改善投資環境的政策方面，包含加速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行稅收優惠政策。並對設在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產業的內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在一定期限內，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另外，也實行土地和礦產資源優惠政策。

分佈的不均度上是否有所改善。希望能藉此研究的探討，讓現有文獻在研究外資於中國分佈不均此一課題上更為完整。

本文研究架構如下：第二節介紹中國大陸的外資開放政策；第三節分析中國大陸的外來投資情況；第四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資料來源；第五節分析外資投資不均衡的程度；第六節為本文結論。

二、中國大陸外資投資政策與投資狀況

吸引外資投資，是中國大陸實現經濟長期成長的重要戰略之一。自一九七九年開始引進外來投資以來^⑫，隨著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吸引外資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回顧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吸引外資政策可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一) 外資起步試點階段（第一階段：一九七九～一九八四）

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利用外資而帶動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先讓一部份的人富起來」的說法之後，即對沿海地區採取重點傾斜的政策，以發展東部為優先，中、西部次之。除了增加東部地區的投資以外，並在政策上給予東部地區優惠及享有體制改革的優先權。也使原本經濟基礎雄厚的東部地區發展加快，而進一步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更為擴大。自此，投資分佈重點開始東移，東部投資比重上升，中、西部大部分省區投資比重下降。

中國政府於一九八〇年在南部沿海地區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而早期利用外資投資主要形式的三資企業，主要多在深圳經濟特區^⑬。一九八四年，中國大陸接著在沿海地區設立了十四個開放城市^⑭。此外，中國大陸也開始建立起一套對外國投資進行管理的法律體系^⑮。由於此階段的法律制訂暫屬實驗試探的性質，以致於在此時的外資投入並不多，引進的多是一些「三來一補」項目^⑯。而且，東部沿海地區在時間上開放的較早，不僅具有政策上的優勢，在勞動素質及生活環境上也較佳，使得外資投資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

註⑫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決定，國務院之下設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作為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對口管理機構。隨後於1982年，併入對外經濟貿易部。

註⑬ 四個經濟特區為：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而三資企業為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

註⑭ 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為：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

註⑮ 在1979年7月1日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1980年中共國務院頒佈了《關於推動經濟聯合暫行規定》，規定中確立了「揚長避短、發展優勢、保護競爭和促進聯合」的方針。

註⑯ 「三來一補」主要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以及補償貿易。

(二) 外資投資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一九八五～一九九一)

中共國務院在一九八五年決定開放長江、閩南及珠江等三個三角洲。董輔礪指出，這是繼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之後，中國大陸對外開放戰略中的「第三行動區」^{①⑦}。一九八六年爲了吸引更多的外資，國務院頒佈《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提供了外資企業在中國大陸從事出口和引進先進技術的優惠政策。一九八八年又開放了遼東半島、膠東半島，一九九〇年將濟南市加入沿海經濟開放區，自此五大開放區從南至北形成沿海帶狀開放地帶。而後，對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是，允許外商興辦第三產業、金融和商品零售業，並允許外商從事轉口貿易和開設外資銀行。此六年間，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得到大幅的改善，外資的投入也開始加快^{①⑧}。

(三) 外資投資快速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一九九二～一九九五)

中國大陸在此一時期開始趨向平衡的戰略發展。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外國投資者對中國大陸市場開始具有較多的信心。一九九三年中共在「第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宣示，要實行全方位開放，其目的在於藉由對少數幾個中西部城市的開放而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而且，此階段亦爲「八五」計畫期間，中共政府提出地區經濟發展戰略，要發揮地區優勢與改善沿海與內陸之間的關係，促進地區經濟朝向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然而，徐東、孫寧認爲從一九九四年開始，十個沿海省市即吸收了八成以上外商直接投資^{①⑨}，而上海、江蘇、福建、山東、廣東更佔據其中三分之二，可見不均的程度相當大^{②⑩}。

中國大陸在外資投入規模增加的同時，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也有很大的變化。在以製造業爲優先發展的策略下，也鼓勵外資進入基礎建設、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國有企業技術改造項目和中低檔住宅項目^{②⑪}。在第三產業方面，一九九二年中共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規定人事體制、價格體系，以及金融、稅收的改革，以促進第三產業朝產業化、社會化、國際化發展。

註①⑦ 董輔礪，*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卷）*，第一版（香港：三聯出版社，1999年），頁244～269。

註①⑧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的資料顯示，截至1991年底，中國大陸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約247億美元。

註①⑨ 10個沿海省市爲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

註②⑩ 徐東、孫寧，「中國利用外資的地區失衡問題」，*黑龍江對外經貿（哈爾濱）*，第4期（2003年4月），頁25～27。

註②⑪ 1995年6月頒佈《指導外資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產業項目與外商投資項目分爲鼓勵、允許、限制、禁止等四大類。並且，鼓勵外商向中西部投資，對不同類別的投資項目有不同的優惠待遇與政策。

(四) 積極引導外資投入西部地區 (第四階段：一九九六～二〇〇三)

爲了促進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共人大正式批准《九五計畫與二〇一〇年遠景目標綱要》。具體提出應完成東北地區、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中部五省、西南和華南部分省區、西北地區、東南沿海地區等七大經濟區域的開發構想^②。中共政府期望七大經濟區域能展現自身的特色與優勢，使得外資選擇投資區位時能考慮往西部地區，進一步帶動全面均衡發展，避免因各地區貧富差距過大而產生社會問題。

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使得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的外資投入呈現停滯的狀態，一九九九年及二〇〇〇年更呈現下降的情形。一九九七年底開始中國大陸公佈了多項新的政策，並提出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及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要求^③，以繼續鼓勵外資向中西部投資。爲了增加外資投資中國大陸的信心，外資投資方式趨於多樣化且投資領域也不斷地擴大。一九九九年發佈了《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試點辦法》，將試點擴大到省會城市、自治區，經營的類型由零售擴大到批發。爲了因應加入 WTO 的需要，大多數服務業項目也開始有條件地對外開放。此外，中國大陸亦對外商投資政策進行多項修訂^④，使得二〇〇二年之後外資投資增長速度更爲快速。

朱新輝、王美今證明，外資投資對區域經濟發展確實存在推動效果^⑤。因此，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引導資金進入中西部地區，目的就是想要利用外資來縮小地區性經濟發展的差異。二〇〇一年開始的「十五」計畫，將西部大開發及調整經濟結構列入重點政策。二〇〇三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凡此均顯示出，中國大陸認知到平衡區域發展、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性。就像 Myrdal 認爲，區域間的不均衡成長是國家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⑥。政府必須介入，以推動各種達成各區域均衡發展的政策，並期望外資能

註②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計畫委員會劃分「九五」計畫各經濟區域所涵蓋之範圍。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環渤海地區：北京、天津、山東、山西、河北、內蒙古。長江三角洲地區：江蘇、浙江、上海。東南地區：福建、廣東。中部五省地區：河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南華南地區：四川、貴州、雲南、廣西、海南。西北地區：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

註③ 根據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和《外商投資項目不於免稅的進口商品目錄》，新的規定特別強調產業政策，並鼓勵外商多投資於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還有努力減少中方控股或不許外商獨資的限制。

註④ 例如，修正《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等外資投資相關政策，並自 2002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在此指導目錄中，中國大陸對於服務業、通信業等投資範圍做了相當大的調整。

註⑤ 朱新輝、王美今，「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區域波動」，*中國經濟問題*（廈門），第 2 期（2000 年 2 月），頁 37～44。

註⑥ Gunnar Myrdal, *Rich Lands and Poor: The Road to World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pp. 122～134.

為中西部地區發展帶來更多的貢獻。

三、中國大陸外資投資的地區分佈

由上述可知，中共政府近年來致力於修正吸引外資政策，也為總體均衡作逐步的調整。然而，外資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時間趨勢，以及在各地區分佈情形究竟為何？實有必要在測度外資分佈不均程度之前，先加以瞭解。由於中國統計年鑑所公布的中國大陸官方資料，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各地區只有一九七九～一九八四年外資投資累計總金額。因此，本文在分析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不均度的分析，只限定在一九八五至二〇〇二年（也就是前一節所述的第二階段至第四階段）^⑳。

（表一）提供了中國大陸自一九八五年以來，各年的外來投資的實際金額與協議金額。由（表一）可知，中國大陸的外來投資的實際金額自一九八五年以來逐年攀升。事實上，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外資投資中國大陸的金額並不大。但自一九九二年起，中國大陸吸引外資進入高速成長階段。根據（表一）的資料，一九九二年以後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資金額急速增加，除了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宣示中國政府的持續開放，增加了投資人的信心之外，同年也取消進口替代政策、開始降低進口關稅等政策。而台灣在一九九一年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及一九九三年三月公佈了「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之許可辦法」後，許多台商開始積極赴大陸投資，台灣也成為中國大陸投資主要來源之一。

而且，中共政府為了激發各地區利用外資的效率，不得不下放部分的權力予地方政府。這使得地方政府爭相利用優惠的政策來引導外資投入。另一方面，中共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結束人民幣匯率官價與調劑價分立的雙軌制，而改採單一的以市場供需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故一九九四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巨幅貶值^㉑，一九九四年對一九九三年貶值幅度高達 46.45%，意味著第三階段投資成本縮小。再加上，當時國際油價不斷上漲，外資企業為降低成本而將生產線外移至中國大陸。以上國內外經濟環境因素的影響造成在第三階段實際投資總金額激增。在二〇〇二年時，中國大陸的外來投資的實際金額高達 547.40 億美元，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吸引外資國。

再就外資在地區間分佈的差異來看，若以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數據來分析^㉒，從（表一）中可以發現，一九九二年以前外資分佈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也有很多學者提出了許多因素，例如：東部沿海地區開放較早、基礎設施較佳、勞動

註^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 1986～2003 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註^㉑ 中國「中國人民銀行」1993 年 12 月 28 日發佈「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公告」，宣布 1994 年起施行單一匯率制。

註^㉒ 變異係數為測量相對分散程度的測量數，其為標準差與平均數之比。變異數及標準差也可衡量離散程度，但是會受到平均數的大小及不同衡量單位的影響。因為，變異係數計算結果不受估量單位變動的影響，所以在此採變異係數來計算。變異係數的統計解釋，即為變異係數越大代表數值離散程度越大。林惠玲、陳正倉，應用統計學，二版（台北：雙葉出版社，2002 年），頁 87～88。

素質較為優良、教育程度較高、地理位置方便等。從第三階段一九九二年開始，外資實際投資金額分佈集中趨緩的現象，表示外資因為全面開放政策的實施與當時國內外環境因素，而較第二階段均衡分佈，顯示開放政策有相當程度的效果。根據（表一）的數據，外資實際投資在各省的不均程度，第四階段中一九九九～二〇〇〇年在高科技產業資金大量投入特定地區之下又往上攀升。到二〇〇一年以後為因應加入WTO，中共服務業進一步對外開放，利用外資出現了許多突破性的進展。在傳媒、物流、零售百貨、證券方面都允許外資投資之下，二〇〇二年的變異係數又稍微下降。

表一 中國大陸的外資投資狀況與變異係數

單位：億美元

	年	實際投資		協議投資	
		總金額	變異係數	總金額	變異係數
第二階段	1985	15.99	2.55	53.69	2.34
	1986	27.75	2.76	30.38	2.10
	1987	17.84	2.31	38.64	2.35
	1988	31.50	2.27	59.43	2.47
	1989	34.38	2.21	59.32	2.60
	1990	34.26	2.54	67.56	2.45
	1991	44.26	2.43	112.56	2.53
第三階段	1992	110.04	2.02	584.86	1.90
	1993	273.42	1.68	1049.10	1.82
	1994	332.62	1.70	802.68	1.78
	1995	372.15	1.70	912.63	1.70
第四階段	1996	418.80	1.70	729.83	1.55
	1997	463.74	1.63	527.10	1.43
	1998	471.91	1.68	545.47	1.42
	1999	414.53	1.85	420.80	1.35
	2000	420.44	1.84	659.04	1.59
	2001	483.14	1.73	687.33	1.58
	2002	547.40	1.67	822.42	1.7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6～2003年）；對外經濟貿易統計年鑑（1986～2003年）；中國商務部外資統計，<http://www.moftec.gov.cn>。

此外，外資多投資於東部沿海地區，也與東部沿海地區因襲種種優勢而產生的產業群聚效應有關。根據賴銘洲以台商製造業為例，研究中國大陸東部沿海地區省份投資區位選擇時指出，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商製造業著眼於內需市場而赴中國大陸

投資。然而，因中國大陸東部沿海地區擁有各種優勢因素^{註③}，台商製造業想要透過聚集經濟的垂直及水平的整合達到互利，造成台商製造業多集中投資在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聚集效應也會吸引更多外資投資，而帶動區域經濟的成長，李含琳、曹子堅指出外資在通訊設備、集成電路、家用電器、新型建材等都提供了先進技術與資金，進一步推動了華南、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等外資聚集區域的經濟發展^{註④}。還有，殷醒民認為美國、歐洲和日本等跨國公司在上海、廣東、江蘇等地的技術與發明能力轉讓可以促進區域新產品生產，提高生產效率和向更高附加價值生產行為轉移，吸引更多外資流入^{註⑤}。上述研究均顯示東部地區產業群聚效應，應是影響各地區外資分佈差異的原因之一。

爲了進一步分析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分佈情形，本文依據「九五」計畫的分類，將中國大陸三十個省（市、自治區）分爲七大經濟區域（即東北地區、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區、中部五省、西南和華南部分省區、西北地區、東南沿海地區等七組）。由（表二）可以發現，在所有的三個階段中，東南地區經濟區域佔中國大陸整體的外資實際投資的比重，皆高於其它經濟區域。但是，其比重有下降的趨勢，在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期間所佔比重爲 36.58 %。相反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在中國大陸外資實際投資所佔的重要性，卻是日益提高，在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期間所佔比重已提高爲 26.64 %。另一個受到外資青睞的區域爲環渤海灣經濟區域，其所佔中國大陸整體外資實際投資額的比重，在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期間爲 17.64 %。值得注意的是，在積極鼓勵外商向中西部地區投資的第四階段，西北地區所獲得的外資實際投資額較前一階段增長 179 %。但是，若就佔整體外資實際投資比重來看，在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期間僅爲整體外資實際投資額的 1.03 %。西北地區投資總額雖然也是逐年增長，但是相對於其他地區投資比例，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甚至低於其在前兩階段時的比重。

再就各省（市、地區）的外資分佈觀察，在一九八五～一九九一年的第二階段，最受外資喜愛的五個中國大陸投資地區依序爲廣東、北京、福建、上海、遼寧。其中，單就廣東所佔比重就已高達 43.54 %。由廣東與福建所組成的東南地區之所以享有如此高比重的外資，主要是受到大規模的港商與台商投資的結果。自一九九二年起的第三與第四階段，江蘇晉升爲除了廣東之外最受外資青睞的地區，所佔比重達 14.56 %。這是因爲江蘇近年來致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吸引不少高科技外商（特別是台商）到江蘇投資，這使得江蘇的比重由不足 5 %，到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年時達到 12.19 %，

註③ 影響台商在中國大陸東部沿海省份投資區爲選擇各種因素包括：經濟、政府、市場、聚集、勞動、基礎建設及運輸。賴銘洲，「中國大陸東部沿海省份投資區位選擇因素分析—以台商製造業爲例」，*台北銀行月刊*，第 29 卷第 5 期（1999 年 5 月），頁 155～170。

註④ 李含琳、曹子堅，「中國外資進入的十大效應」，*青海師範大學學報*（青海），第 4 期（1996 年 12 月），頁 1～8。

註⑤ 殷醒民，「外資企業技術創新的區域優勢及其績效」，*復旦學報*（上海），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1～10。

表二 中國大陸各地區外資實際投資額

單位：萬美元

經濟區域	第二階段 (1985-1991)		第三階段 (1992-1995)		第四階段 (1996-2002)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環渤海地區	346,164	16.81	1,684,853	15.48	5,679,748	17.64
北京	173,213	8.41	346,835	3.19	1,246,551	3.87
天津	59,382	2.88	325,738	2.99	1,342,312	4.17
河北	20,379	0.99	157,971	1.45	655,138	2.03
山西	3,340	0.16	23,580	0.22	171,310	0.53
內蒙古	4,047	0.20	18,834	0.17	69,021	0.21
山東	85,803	4.17	811,895	7.46	2,195,416	6.82
東北地區	140,054	6.80	682,979	6.28	2,117,148	6.58
遼寧	105,657	5.13	466,030	4.28	1,554,440	4.83
吉林	11,210	0.54	100,055	0.92	248,354	0.77
黑龍江	23,187	1.13	116,894	1.07	314,354	0.98
長江三角洲	273,440	13.27	2,595,448	23.85	8,577,625	26.64
上海	157,904	7.67	901,956	8.29	2,639,471	8.20
江蘇	78,866	3.83	1,326,092	12.19	4,688,447	14.56
浙江	36,670	1.78	367,400	3.38	1,249,707	3.88
中部五省	72,106	3.50	662,634	6.09	2,275,415	7.07
安徽	12,041	0.58	116,486	1.07	251,802	0.78
江西	7,278	0.35	85,845	0.79	327,301	1.02
河南	19,544	0.95	122,335	1.12	377,944	1.17
湖北	19,437	0.94	197,064	1.81	766,080	2.38
湖南	13,806	0.67	140,904	1.29	552,288	1.72
東南地區	1,064,581	51.68	4,303,557	39.53	11,780,003	36.58
福建	167,650	8.14	1,205,516	11.08	2,770,611	8.60
廣東	896,931	43.54	3,098,041	28.47	9,009,392	27.98
西南華南	112,115	5.44	833,407	7.66	1,436,760	4.46
廣西	27,157	1.32	257,553	2.37	439,925	1.37
海南	49,215	2.39	313,981	2.89	410,593	1.28
四川	24,575	1.19	214,688	1.97	476,857	1.48
貴州	7,090	0.34	18,339	0.17	25,891	0.08
雲南	4,078	0.20	28,846	0.27	83,494	0.26

(續下頁)

(接上頁)

經濟區域	第二階段 (1985-1991)		第三階段 (1992-1995)		第四階段 (1996-2002)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西北地區	51,365	2.49	119,427	1.10	332,858	1.03
西 藏	3	0.00	0	0.00	0	0.00
陝 西	44,122	2.14	84,270	0.77	249,653	0.78
甘 肅	1,153	0.06	16,398	0.15	40,909	0.13
青 海	285	0.01	797	0.01	9,181	0.03
寧 夏	111	0.01	2,342	0.02	13,837	0.04
新 疆	5,691	0.28	15,620	0.14	19,278	0.06
總 計	2,059,825	100.00	10,882,305	100.00	32,199,557	100.0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6～2003年）、中國對外經貿統計年鑑（1986～2003年）與中國商務部外資統計，
<http://www.mofcom.gov.cn>。

註：1. 此處實際投資金額為外資直接與其他實際投資的加總。

2. 重慶市於1997年由四川省劃分出來，但是基於資料處理上的一致性，本文將1997年以後的重慶市數據併入四川省一起計算。

再到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時高達 14.56 %。而且在藥廠、量販店、電子產業以及其他製造業進駐之下，也讓長江三角洲地區挹注了國際化元素，成為另一個外資集中的據點。在第三與第四階段時期，依佔整體實際外資投資比重的高低排序為廣東、江蘇、福建、上海、山東。雖然廣東依舊享有最大比重的外資實際投資，但其比重在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時已降至 27.98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福建。可見，未來外資將可能更進一步由東南經濟區域轉向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投資。殷醒民認為隨著外來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技術開發的資金投入也出現了持續增加的趨勢，外資企業技術開發經費中有 70 % 投資於上海、江蘇、廣東地區，而近年來上海的技術引進經費相對比重日益增加，顯示出長江三角洲的重要性^③。

本節在分析外資於中國大陸各地區分佈不均的程度，僅是建立變異係數的衡量。本文以下，利用更具經濟學理的衡量方法，以期能瞭解更多有關中國大陸外資投資分佈不均的原因及特徵。

四、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在探討外來投資在中國大陸地區間分佈的不均程度。因此，衡量外資分佈不均程度的方法便顯得相當重要。目前學界在衡量分配程度的方法，主

註^③ 殷醒民，前引文，頁1～10。

要為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④。例如，曹添旺採用吉尼係數，來探討臺灣一九八〇～一九九三年家庭所得分配不均度的結構及變化⑤。Tsui 利用吉尼係數，來比較中國大陸的三級產業發展對其所得分配不均影響的程度⑥。Yang 則是利用吉尼係數來計算四川及江蘇兩省，在經濟改革前後的城市與鄉村所得不均程度，藉以分析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政策對其所得不均的影響⑦。而 Huang, Kuo, and Kao 也利用吉尼係數計算中國大陸在一九九一～二〇〇一年期間，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均程度⑧。

吉尼係數是一般常用的不均度衡量指標，通常是用來分析一國（地區）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吉尼係數值在[0, 1]的範圍內，係數值越大，表示所得分配不均等的程度越高；反之，表示不均等的程度越低。此外，Paglin (1975) 認為⑨，傳統的吉尼係數有高估不均程度的問題，所以提出吉尼係數可分解成組間 (between-subgroup) 和組內 (within-subgroup) 效果的論點。而 Mookherjee and Shorrocks 則是將吉尼係數分解為組間和組內差異的過程，作一個詳細的證明⑩。由此可知，利用吉尼係數可以進一步瞭解外資在地區間分佈不均的來源。因此，本文主要是採取 Mookherjee and Shorrocks (1982) 修改後的吉尼係數計算方式，來衡量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分佈不均的情形。其計算方式如下：

$$G = \frac{1}{n^2 \mu} \sum_i \sum_j |y_i - y_j| \quad i \neq j \quad (1)$$

第(1)式中， n 為中國大陸的地區（包括省、市、自治區）個數，等於30⑪， y_i 和 y_j 分別代表第 i 和第 j 個地區的外來投資額（為直接投資與其他投資的總額）； μ 表

註④ 此外，在衡量不均的方法中，Generalized Entropy Method (GEM) 也是一種常用的指標，可用來測度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分佈不均的情形。由於中國大陸在 1985～2002 年間，西藏、海南...等地區的外資投資金額有些年份為 0。致使 GEM 無法計算，所以本文僅採用吉尼係數來計算中國大陸各地區外來投資之不均程度。

註⑤ 曹添旺，「臺灣家庭所得不均度的分解與變化試析，1980-1993」，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8卷第2期（1996年6月），頁181～219。

註⑥ Kai-yuen Tsui, "Economic Reform and Interprovincial Inequal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50, no. 2 (1996), pp. 353～368.

註⑦ Dennis Tao Yang,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pp. 306～310.

註⑧ Jr-Tsung Huang, Chun-Chien Kuo and An-Pang Kao, "The Ine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etween 1991 and 2001,"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1, no. 3 (Fall 2003), pp. 273～285.

註⑨ Morton Paglin, "The Measurement and Trend of Inequality: A Basic Revi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4 (1975), pp. 598～609.

註⑩ Anthony Shorrocks and Dilip Mookherjee,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Trend in UK Income Inequa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2, no. 368 (1982), pp. 886～902.

註⑪ 重慶市於 1997 年由四川省劃分出來，但是基於資料處理上的一致性，本文將 1997 年以後的重慶市數據併入四川省一起計算。

示平均每一個地區的外來投資額，即 $\sum_{i=1}^30 (V_i/30)$ 。

爲了瞭解外資投入在中國大陸地區間分佈不均的情形，主要來源是在組間差異或組內差異，本文依據「九五」計畫的分類，將中國大陸三十個地區分爲七大經濟區域^②。根據 Mookherjee and Shorrocks (1982)，第(1)式可以進一步分解爲：

$$G = \sum_k v_k^2 \lambda_k G^k + \sum_k \sum_h v_k v_h |\lambda_k - \lambda_h| \quad k \neq h \quad (2)$$

第(2)式等號右邊第一項和第二項，分別表示組內差異和組間差異。 v_k 和 v_h 分別表示第 k 和 h 組經濟區域的地區個數相對於整體地區總個數的比例； λ_k 和 λ_h 分別表示第 k 和第 h 組經濟區域的平均各地區外來投資額相對於整體平均各地區外來投資額 μ 的比例； G^k 表示不考慮其他組時，第 k 組經濟區域內的吉尼係數。

本文在各地區外資投入之實際金額及協議金額的資料來源方面，主要以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對外經貿統計年鑑以及中國商務部網站所公佈的外資數據爲主。由於中國統計年鑑所公布的中國大陸官方資料，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各地區只有一九七九～一九八四年外資投資累計總金額。因此，本文在分析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不均衡的程度，只限定在一九八五至二〇〇二年。

五、外資在地區分佈不均度之分析

如前所述，以中國大陸歷年外資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外資有集中在某一些區域，特別是沿海區域的省分。但是，單以觀察外資統計數據較難瞭解外資集中的程度。所以，本文利用第(1)式計算外來投資於中國大陸的吉尼係數，以分析外來投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分佈不均的程度。再以第(2)式對吉尼係數加以分解爲組間差異與組內差異，進一步瞭解此一外資在地區間分佈不均的情況，主要是來自於中國大陸七大經濟區域間的分佈不均，抑或是來自於各經濟區域內各地區的分佈不均。本節以下，就整體外資分佈不均的情形加以分析。

先以整體外資投資額在三十地區(省市)的不均程度來看，從(圖一)可以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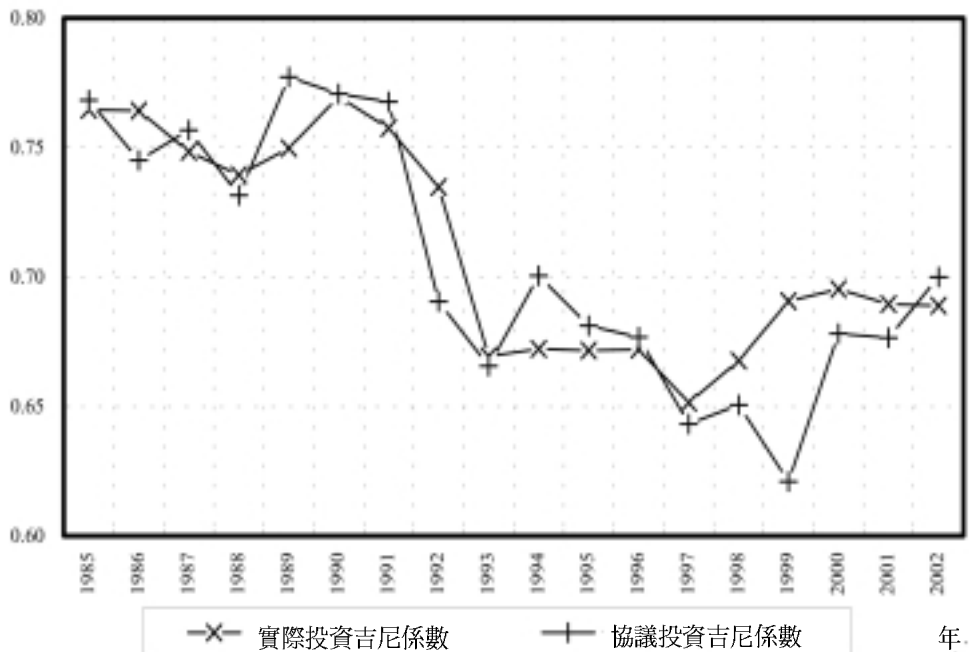
註② 有關海南省屬於「七大經濟區域」中的華南西南地區是否恰當之問題。在本文中將海南歸屬於華南西南地區的原因，是依照中國大陸國家計畫委員會劃分「九五」計畫各經濟區域所涵蓋之範圍，其中西南華南地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廣西、海南等地。本文並未考慮海南省納入華南西南地區的適當性，只單純思考以中國大陸官方的分類作區分的依據。作者非常感謝評論人對於此一問題的提醒。

註③ 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對外經貿統計年鑑只公佈1985及2001、2002年的外資協議金額之直接投資金額，缺乏外資協議金額之其他投資金額數據。因此，1985年與2001、2002年協議金額僅以外資直接投資計算。

在一九八五~二〇〇二年間外資實際投資金額的吉尼係數，介於 0.65~0.77 之間；而外資協議投資金額的吉尼係數，介於 0.62~0.78 之間^④。在吉尼係數以[0, 1]為範圍限定之下，外資實際投資金額的吉尼係數每年皆超過 0.65。這樣的數據顯示出在一九八五~二〇〇二年間，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分佈有著相當不均衡的狀況。由於外資協議投資金額，並非是實際的投資金額，充其量只能視為外商投資意願的表達。因此本文以下，主要針對外資實際投資金額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分佈不均的程度加以分析。而協議投資金額的吉尼係數，主要是當做參考之用。

先就外資投資額在中國大陸各地區間分佈不均度的時間趨勢來看，若依據第二節中將一九八五~一九九一年視為中國大陸吸引外資的第二階段，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年視為第三階段，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視為第四階段，由（圖一）可以發現，第二階段的外資投資額的吉尼係數最高。也就是說，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分佈，以第二階段的不均程度最高。在第三階段時，此一分佈不均的情形有相當程度的改善，最後在第四階段的初期，分佈不均的現象持續改善。（圖一）的變動趨勢表達了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的外資，在中國大陸開放初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近年來，以內需導向的外資則必須接近消費市場，必然不像早期的外資那麼集中於沿海。

圖一 外資實際投資與協議投資吉尼係數



在一九八五~一九九一年間中國大陸吸引外資的第二階段，外資投資額在各地區分佈的不均程度，遠超過以後的階段。這樣的現象，主要是此一時期為中國大陸吸引

外資的初期，採取成立經濟特區與開放了十四個試點城市等政策。這使得大量的外資跟隨中共政府開放政策的引導，進入這些特定開放地區。也使得外資實際投資額的吉尼係數，在此一時期的各年都超過 0.70。當時的外國資金高度集中在這些沿海開放特區及城市，所以中國大陸內陸與沿海經濟活絡程度呈現兩極化。

由第二節中可知，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確立市場開放的決心以後，「沿海、沿江、沿邊」的三「沿」戰略，較過去重視平衡發展的觀念。在一九九五年中國大陸鑑於資源、國民所得、投資投入過於偏重東部地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〇一〇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縮小區域間發展的差距為政策目標。到了「九五」計劃（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時期，更強調中、西部地區的發展^④。而一九九九年江澤民強調「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性，不僅在二〇〇〇年初成立「西部開發領導小組」，而且將「西部大開發」列為施政重點納入「十五」計劃（二〇〇一～二〇〇五年）中。至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佈國務院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表示中國大陸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邁出實質性的步伐。所以，在一九九二～二〇〇二年時期的吉尼係數都比一九八五～一九九一年時期來得低。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心，有些微地呈現由沿海向內陸轉移的軌跡，外資投資的地區也逐漸開始轉移，張新也說明了，中國大陸在中西部地區一些大型工程項目對外投標吸引了外資進入，如三峽工程與二灘水電站^⑤。但是，以一九九五年實際金額的吉尼係數為 0.67，至二〇〇二年則為 0.69 來看，外資投資不均衡程度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些微上升趨勢。也就是說，上述平衡發展政策的施行，就目前而言並沒有顯著的效果。這主要是在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期間，中國大陸下放部分權力給予各地方政府，讓各地方政府向外商提供各種優惠措施來引導資金投入，造成外資集中在特定地區。

雖然，近幾年西部地方的基礎建設、特殊產業已經因外資投入而增加了其經濟活力。但是，由徐東、孫寧的研究中可知道，從一九九四年開始上海、江蘇、福建、山東佔據全中國大陸五成以上的外資投資^⑥，以及殷醒民利用技術開發人員、技術開發經費、技術改造經費和技術引進經費等四項指標，計算出上海、廣東、江蘇等東部地

註④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了指導往後十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條基本方針，其中第八條是堅持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江澤民在五中全會閉幕時闡述《正確處理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中，「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關係」的方針。他進一步指出：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今後改革和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從「九五」計劃開始，要更加重視支持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逐步加大解決地區差距繼續擴大趨勢的力度，積極朝著縮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註⑤ 張新，前引文，頁 67～70。

註⑥ 徐東、孫寧，前引文，頁 25～27。

區技術開發相關經費相對比重日益增加之研究，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興起一波高新技術產業投資的熱潮，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更吸納了高額的投資資金進入特定地區，使得中國大陸外資直接投資結構改變^④。由此，可推測高科技產業聚集在東部地區是讓近年來吉尼係數升高的因素之一。而且，尹希果、任毅、王韜也認為，近年來東部地區，在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高的行業中，外資直接投資的數額和比例大大增加，電子與通訊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行業、醫藥工業、化學工業、電器設備製造業等資金、技術密集的行業成爲重點行業，高科技產業投資加大^⑤。間接表示東部地區因技術、資金密集之高科技產業進駐，產生中國大陸外資分佈更加相對傾斜的情況。

至於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分佈不均的來源，由（表三）可以發現，若以吉尼係數來看，外資實際金額及協議投資金額的組間差異佔吉尼係數的比重，都高達65%以上。這意味著外資在中國大陸的地區分佈高度不均的情況，主要來自於外資在中國大陸七大經濟區域間的分佈不均。也就是說，七大經濟區域中每一個經濟區域外資投入的金額差距過大，解釋了大部分的吉尼係數值。這樣的結論，主要是因爲大部分外國投資者對東南地區經濟區域、環渤海經濟區域、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具有高度的投資意願（參見表二）。尤其外資多投入在以廣東及福建構成的東南地區。雖然，中國大陸七大經濟區域的外資投入的集中程度有稍微趨緩的情形，但是資金集中在上述三個地區的情況仍然相當嚴重。這也顯示，外資在中國大陸同時存在有區域性「投資缺口」與「投資擁擠」的現象。

此外，中國大陸幅員廣大，有許多地區因爲地理環境特殊、交通不便或人口稀少等因素造成外資缺乏，甚至國內投資也呈現相當稀少的情況。所以，依據（表二）將在一九九二～二〇〇二年間擁有全部外來投資比重不到1%的省、市、地區樣本排除，再來觀察其吉尼係數的趨勢變化^⑥。從（表三）中可以看出，外資在中國大陸地區十七個省、市、地區樣本分佈的吉尼係數低於未扣除前的數值，但不均衡的趨勢與未扣除之前並無差異。另外，實際及協議金額的組內差異佔吉尼係數的比重都比較低。這也顯示中國大陸在「九五」計畫期間，依照各地區的地理環境、產業特色所劃分的七大經濟區域，都能合乎計畫中所安排的地區性結合發展。致使每一個經濟區域中，各地區間的外資投入差距很小。

註④ 殷醒民，前引文，頁1～10。

註⑤ 尹希果、任毅、王韜，「東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結構的比較分析」，*江西財金大學學報*（南昌），第25期（2003年2月），頁17～20。

註⑥ 共排除13個省、市、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表三 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分佈之吉尼係數及其來源

	年	外資實際投資額				外資協議投資額			
		吉尼係數	組間(%)	組內(%)	吉尼係數 (17個省市地區)	吉尼係數	組間(%)	組內(%)	吉尼係數 (17個省市地區)
第二階段	1985	0.76	89.12	10.88	0.65	0.77	74.85	25.15	0.69
	1986	0.76	86.07	13.93	0.72	0.75	65.64	34.36	0.67
	1987	0.75	80.49	19.51	0.66	0.76	75.43	24.57	0.69
	1988	0.74	76.88	23.12	0.66	0.73	89.24	10.76	0.62
	1989	0.75	84.35	15.65	0.65	0.78	90.51	9.49	0.70
	1990	0.77	85.92	14.08	0.67	0.77	90.81	9.19	0.66
	1991	0.76	86.27	13.73	0.63	0.77	89.84	10.16	0.66
第三階段	1992	0.73	86.42	13.58	0.60	0.69	88.93	11.07	0.55
	1993	0.67	87.01	12.99	0.52	0.67	87.31	12.69	0.53
	1994	0.67	86.96	13.04	0.51	0.70	88.88	11.12	0.55
	1995	0.67	88.22	11.78	0.53	0.68	89.55	10.45	0.54
第四階段	1996	0.67	90.03	9.97	0.53	0.68	90.93	9.07	0.54
	1997	0.65	88.59	11.41	0.50	0.64	83.94	16.06	0.49
	1998	0.67	88.60	11.40	0.50	0.65	86.70	13.30	0.50
	1999	0.69	91.00	9.00	0.55	0.62	87.58	12.42	0.46
	2000	0.70	89.15	10.85	0.55	0.68	86.98	13.02	0.54
	2001	0.69	88.92	11.08	0.54	0.68	88.55	11.45	0.55
	2002	0.69	87.00	13.00	0.53	0.70	88.28	11.72	0.57

資料來源：同表二。

註：1. 本文將中國大陸區分為七大經濟區域，作為計算的基礎。所以，吉尼係數為中國大陸三十個省、市之不均程度。組間效果表示，七大經濟區域之間不均衡的程度在吉尼係數中所佔的百分比；組內效果表示，每一個經濟區域中各省、市之間的不均程度在吉尼係數中所佔的百分比。

2. 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環渤海地區：北京、天津、山東、山西、河北、內蒙古。長江三角洲地區：江蘇、浙江、上海。東南地區：福建、廣東。中部五省地區：河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南華南地區：四川、貴州、雲南、廣西、海南。西北地區：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

3. 依據表二所計算出一九九二~二〇〇二年外資直接投資的比重，將投資比重不到1%的省市、地區排除所剩下的十七個省市地區樣本。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上海、江蘇、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四川。

六、結論與政策意涵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衡量與分析外來投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間分佈不均的程度。文中所採用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對外經貿統計年鑑、以及中國商務部網站所提供的中國官方資料。並採取 Mookherjee and Shorrocks 修改後的吉尼係數，做為衡量外資分佈不均的方法^⑤。

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為，在一九八五～二〇〇二年間，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分佈有著相當不均衡的狀況。若由時間趨勢來看，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分佈，以一九八五～一九九一年的不均程度最高。在一九九六～二〇〇二年時的初期，分佈不均的現象有所改善，這和外資早期著重出口、近期開發內需的投資政策有關。但是在一九九八年以後，因高科技產業大量向特定區位投資下，外資在地區分佈不均的程度有上升的趨勢。並且，外資在中國大陸的地區分佈高度不均的情況，主要來自於外資在中國大陸七大經濟區域間的分佈不均。

事實上，上述的研究結果只是對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的階段設計的反射。其經濟改革主要是採取區域差距及時間差距的改革策略，而非採取全面性的改革進程，也就是採取「先讓一部份的人富起來」的政策。所以，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大部分外資就跟隨中國政府的開放政策進入東部沿海地區，尤其廣東省是開放最早的經濟特區，外資大量流入之後便產生「投資擁擠」的現象。許多學者提出外資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原因，包括政策性的因素、國民所得較高、基礎設施完善、產業聚集效應、教育水準較高、資訊成本較小、行政效率較佳等。但是，這種非均衡發展的策略，引起各地區之間外資投入差異過大的問題。各地區外資投資差異過大，對於內陸地區的優勢產業未善加利用開發，也無法達到中國大陸「以東帶西」的經濟全面發展目標。而外資在各地區投資嚴重不均衡，會使得中國大陸的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異過大。Huang, Kuo, and Kao 指出，中國大陸各地區經濟差異過大，將可能會產生許多社會問題^⑥。

因此，中國大陸於一九九五年提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方針，並於一九九九年提出的「西部大開發」全面均衡為目標的戰略^⑦。但是，從吉尼係數整體趨勢來看，一九九五～二〇〇二年外資投資的地區分佈不均並無縮小的情況。也就是說，外資並沒有因縮小區域發展的方針，及「西部大開發」的開展而相對多投資於西部；反而隨著

註^⑤ Mookherjee and Shorrocks,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Trend in UK Income Inequality," pp. 886~902.

註^⑥ Huang, Kuo, and Kao, "The Ine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etween 1991 and 2001," pp. 273~285.

註^⑦ 「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有利於中國大陸經濟結構的調整，可以為東部地區產業升級和資金、技術、人才轉移提供新的發展空間，西部的開發會帶動整個中國大陸的繁榮與現代化。邱宏輝，「西部大開發對大陸整體經濟之影響」，*中共研究*，第34卷第12期（2000年12月），頁57~76。

中國大陸市場化的腳步，而多投資於東部地區。這與中國大陸近年來外資投資結構的改變有關，沿海地區偏向投資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而西部地區較偏向投資低資本密集產業。中國大陸也因此在一九九八年之後外資不均程度又逐漸增加。

所以，現階段「西部大開發」政策，對於中國大陸整體經濟似乎沒有顯著的平衡效果。「西部大開發」無法積極發揮效果，邱宏輝認為是西部水資源的缺乏、教育素質的低落、中央限制部分地區開放及對資源的低價調撥政策、經濟結構的問題、開發戰略的問題等五項因素，這使得西部地區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這也是由於，外資企業投資中國大陸的動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考量，而非遵循中國大陸當局所規劃的宏觀調控政策。而楊儉英也認為西部地區外資利用度偏低與政策性因素、環境與基礎設施因素、觀念和效率因素有關^⑤。外資企業大都選擇在交通、基礎建設較為完善和投資回收快、收益率較高，以及產業性質相似的區域發展。這種以利潤為導向的發展策略，與中國大陸以優先發展東部來帶動其他地區發展的策略並不相容。並且，隨著外資投入量的增加，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集中程度也越高。雖然，目前外資進入內陸地區投資服務業，但因政府政策的緣故，大部分都採取設點服務並未全面推展，以致於外資在內陸地區貢獻並無如沿海地區進駐高科技產成效如此之大。

在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其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將較過去更加市場化。例如，關稅逐年降低、非關稅貿易障礙逐步消除、服務貿易市場逐漸開放等，這都將造成中國大陸經濟體制進一步發生質變。在新的環境之下，著名跨國企業到大陸投資者愈來愈多，而且平均投資規模也愈來愈大。如果，中國大陸再不審慎思考外資分佈惡化的問題，並謀思對策加以解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化將因外資分配不均而更加惡化。

未來，中國大陸應更進一步依照各地區的資源分佈與產業特色來引導外資投資，並改變以往從地區別著手吸引外資投資，以具有各地區特色產業政策，平緩外資投資不均程度。例如，東部地區應增加創新研究投入，注意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努力改善產業的國際分工地位；而中西部地區應該大力推進市場化進程，提高經濟發展的市場化水準，培育和完善市場體制，注重中間技術的利用。尹希果、任毅、王韜也提到西部地區可利用 BOT (Build- Operate - Transfer) 投資方式及以企業為主體的對外融資來增加引資方式^⑥，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各地方政府必須針對本身的競爭優勢，規劃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的優勢產業，不能再策劃以短期回收為目的的投資策略。而且，各區域之間交通建設、基礎設施及人才配置也要平衡發展。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必須重視外資在服務業投資的發展，如此才能真正讓中國大陸地區經濟發展

註⑤ 楊儉英，「利用外資加快西部經濟發展的對策」，蘭州石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甘肅），第3卷第1期（2003年1月），頁51~53。

註⑥ BOT即興建—營運—移轉，亦即由政府將土地設定地上權後，出租給民間業者從事開發及營運，經特定時間後，再移交給政府。BOT的運作方式，這些年來已經蔚為風潮，成為許多國家執行基礎建設的一種重要方式。

差距縮小。中國大陸各地區發展差異若持續擴大，除了會威脅到中國政權的穩定，對於台商海外投資佈局也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台商資金過於集中在沿海地區，會使得台商產業結構佈局產生資源浪費的情況。中國大陸各地區若能善加利用自身優勢而發展出有特色的區域經濟，台商就可以依照企業的發展策略來選擇合適的投資區位，將資金、人力、技術等資源做最妥善的安排，對台灣經濟的提升也將有很大的貢獻。

* * *

(收件：93年3月17日，接受：93年4月20日)

An Analysis of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mong Regions in China

Jr-tsung Huang & An-pang Kao & Tzu-ying Yu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mong regions in China. Using official data from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the Almanac of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the PRC Ministry of Commerce website, and the modified Gini coefficient—a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proposed by Mookherjee and Shorrocks (1982), the primary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unequally distributed among regions of China between 1985~2002. This inequality results primarily from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among seven economic areas, which are called “between-area” differences.

Keywords: China; foreign investment; Gini coefficient; inequality JEL Classifications: D39; F21; P21

參考文獻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 1986~2003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對外經貿統計年鑑 1986~2003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中國外資統計，中國商務部網站，<http://www.mofcom.gov.cn>。
- 尹希果、任毅、王韜，「東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結構的比較分析」，**江西財金大學學報**（南昌），第25期（2003年2月），頁17~20。
- 朱新輝、王美今，「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區域波動」，**中國經濟問題**（廈門），第2期（2000年2月），頁37~44。
- 李清俊，「外商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10期（1998年10月），頁43~52。
- 李含琳、曹子堅，「中國外資進入的十大效應」，**青海師範大學學報**（青海），第4期（1996年12月），頁1~8。
- 林惠玲、陳正倉，**應用統計學**，二版（台北：雙葉出版社，2002年）。
- 邱宏輝，「西部大開發對大陸整體經濟之影響」，**中共研究**，第34卷第12期（2000年12月），頁57~76。
- 徐東、孫寧，「中國利用外資的地區失衡問題」，**黑龍江對外經貿**（哈爾濱），第4期（2003年4月），頁25~27。
- 曹添旺，「臺灣家庭所得不均度的分解與變化試析，1980-1993」，**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8卷第2期（1996年6月），頁181~219。
- 張新，「我國利用外資的地區分佈特點與對策」，**武漢教育學院學報**（武漢），第2卷第18期（1999年4月），頁67~70。
- 黃智聰、潘俊男，「大陸地區製造業產業結構的決定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45卷第2期（2002年3月），頁97~123。
- 楊儉英，「利用外資加快西部經濟發展的對策」，**蘭州石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甘肅），第3卷第1期（2003年1月），頁51~53。
- 董輔祜，**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卷）**，第一版（香港：三聯出版社，1999年）。
- 殷醒民，「外資企業技術創新的區域優勢及其績效」，**復旦學報**（上海），第1期（2003年1月），頁1~10。
- 賴銘洲，「中國大陸東部沿海省份投資區位選擇因素分析—以台商製造業為例」，**台北銀行月刊**，第29卷第5期（1999年5月），頁155~170。
- Broadman, Harry G. and Xiaolun Sun,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World Economy*, vol. 20, no.3 (Fall 1997), pp. 339~361.
- Hsiao, Cheng and Victor Gastanaga, "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 an Analysis of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Review of Pacific Bas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cies*, vol. 4, no. 4 (Winter 2001), pp. 479~493.
- Huang, Jr-Tsung Chun-Chien Kuo and An-Pang Kao, “The Ine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etween 1991 and 2001,”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1, no. 3 (Fall 2003), pp. 273~285.
- Huang, Fanzhang “China’s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6, no. 2 (Summer 1995), pp. 217~232.
- Hu, A. and G. Jefferson, “FDI Impact and Spillover: Evidence from China’s Electronic and Textile Industries,” *World Economy*, vol. 25, no. 8 (August 2002), pp. 1063~1076.
- Myrdal, Gunnar *Rich Lands and Poor: The Road to World Prosperity*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57), pp. 122~134.
- Paglin, Morton “The Measurement and Trend of Inequality: A Basic Revi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no. 4 (1975), pp. 598~609.
- Shorrocks, Anthony and Dilip Mookherjee,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Trend in UK Income Inequa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2, no. 368 (1982), pp. 886~902.
- Tsui, Kai-yuen “Economic Reform and Interprovincial Inequal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50, no. 2 (1996), pp. 353~368.
- Wei, Yingqi Xiaming Liu, David Parker and Kirit Vaidya,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vol. 33, no. 9 (September 1999), pp. 857~867.
- Yang, Dennis Tao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pp. 306~310.
- Zhang, Wei “Rethinking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 34, no. 1-2 (2001), pp. 113~138.

